

王二慶
陳慶浩

莊雅州
內山知也

主編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

第一輯
筆記叢談類一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王三慶 莊雅州
陳慶浩 內山知也
主編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

第一輯 第一冊

筆記叢談類一

啜茗談柄

賢乎己

當世新話

日本虞初新志

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

譯準綺語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日本財團法人斯文會
法國科研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

出版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贊助

《日本漢文小說叢刊》

王序（中文）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王三慶

在歷史上的各個階段，「中國」這一詞彙的涵義，或多或少都有些許的改變及差異。從時間軸來講，遠溯早期的部落氏族到一家天下以後的歷朝各代，或長或短都有不同朝代的主宰時期。從空間軸而論，或因治績的良窳，國力的盛衰，而使幅員有了大小的改變。然後在以上兩軸的規範下，勿論居民，還是語言，以及文化上的種種內涵，隨時隨地都有不同的變化和差異成分，造成兩軸間函數內容的移動現象。因此，以今視古，所謂的今日中國非全等同於歷史上各個朝代的中國，從疆域、種族、語言或文化而言，它是不斷的在融合變化之中。

然而切莫忽略，勿論如何的談論中國意涵問題，它還是具有基本的核心空間與成員，以及空間成員間種種共通的成分與規律特色。這些共通的成分與規律特色在此兩軸現象之內所以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也非個人意志和少數人的力量所可達成。它是在自然與人為力量的交集作用下，存在著某些共同的需要，逐漸的統合，終於凝聚為一。反之，共同需要如果沒有那麼迫切，也會因此各自為政，在牽引不緊的結合鍵下形成鬆散結構，終於走向分裂之途。所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絕非戲言，而是端看需要的交集與否，以及結合鍵下誰能獲取種種利益，勿論是提供者或汲取者，都能從中取得一己之利，使兩者間維持在穩定的平衡點上，才有互相統合為一的可

能；至於取得最大利益的受惠者，往往是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上真正需要的被統合者，統合者如果不能犧牲部分的利益用以換取主宰統合領導的權利，則其統合的力量也不過是短暫的撮合，不穩定的結合基礎隨時會告鬆脫，遲早必將煙消雲散，而走向分裂。

在統合的過程中，文化常常是最先滲透而統合的前鋒，也是一種最自然而不具威脅的無形力量，不似政治武力受到人為力量那麼強烈的干預，以及君臨天下的脅迫感。也因如此，中國文化勿論在任何時間內，憑恃著核心集團所具備的廣袤地理空間和眾多人口，在漫長的時間內，既衝突又消解的過程中，自然匯流，形成一股龐大而共通的文化成分與規律特色。相對於周邊的民族文化而言，也較具強烈的優勢地位，同時也對周邊民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只是文化間的匯流和統合，不是單向的往來，而是雙方相互的交流，去取之間端看雙方的需要而決定。中國文化隨著時間的拉長和成員的流播，不斷的向四周民族作了強勢擴散；加上一些非原來成員的內聚，凝聚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成為隨時變異的新中國文化。同時，自身的文化也融入了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文化內涵中，增長了新的異國文化內容。於是使自身與周邊的民族與國家，具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謂東方文化的核心內涵。

歷史告訴我們，文化的輸出模式不外是國家的暴政與動亂的出現，迫使內部人民為著脫離苦海，攜家帶眷尋求一個安全理想的未來，語言文化自然也隨著移駐於當地，一旦移駐達到某一基本數量，自然產生質變，於是對當地而言，這是文化輸入交流改變的開始，也是舊有文化的質變與新文化產生的動力。另一種輸出方式則是帶有強烈的優越文化感，以誇耀式作壓迫性的輸出，不費一兵一卒，直讓對方主動臣服接受；或者受到對方的威嚇而自動來獻。《後漢書》中記載武帝滅了朝鮮，倭國使驛來通者三十許國，即是一例。不過這種被動式的輸出或輸入，絕對不是長

久之計，無法持之永恆，它常隨著雙方政治的變動而消長。唯有非受迫性的屈服及被動式引進的輸入模式，才能細水長流，因為它是主動積極進取的追求與一種自覺反省的內部需要。隋唐以後，日本派遣大量的使節團和明治期間大量奔赴英美的留學生，主動引進異國文化即是極其明顯的例子。這些學者到了當地，常常是有計劃、有意志的為其本國攜回重要而有益於經國濟世的重要文物，畢竟形而上的文化最能具體呈現的唯有這些形而下的器物罷了。

從《古事記》一書的文獻（西元七二二年）記錄，中國古文獻之傳入日本，是由王仁從百濟帶來《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開始^①。隋唐以後，因為海運的開通，中日兩國來往益加頻繁，以迄唐昭宗景福年間（西元八九四年），從日本先後派出了二次的遣隋使和十九次的遣唐使，每次伴隨而來的人數多達百計，其中有留學生、和尚、百工和其它人士。這群人縱然沒有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的壯舉，卻也需要擠在同樣狹小的船艙中，頂著顛簸的風浪和冒著生命的危險，漂洋過海，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極為出色的貢獻。如武后長安年間（西元七〇一年—七〇三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文。」隨行者還有《萬葉集》作者之一的山上憶良，或如隨著第八次遣唐使而來的吉備真備等著名人物，而玄昉、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遠、圓真、宗睿等僧人從中國攜回日本的文物更高達五千多卷，其中除了經、史、子、集等傳統四部載籍外，更有為數不少的佛教經典。今天我們在日本公私立圖書館或寺廟中看到有關奈良、平安朝時期的古本佛典寫經和一些中國載籍，大部份是這個時期的遺留舊物，或者是當時的過錄及再過錄的抄本。當然，其中也有部份是中國僧人或商人媒介過去的，如有名的佛教大師鑑真和尚在天寶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東渡成功，隨行時攜帶的東西除了佛典外，也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真蹟或本草醫籍等；而仁壽年間（西元八五一年）過逝的藤原岳守，也因職務上的關係，在抄檢唐

人的貨物中，居然得到了《元白詩筆》。

這等的輸入與輸出，彙聚後的總結，雖然經過貞觀十七年（西元八九四年）冷然院大火の洗禮，燒去了不少的宮中藏書，然其殘存載籍在日本仁和、寬平年間（西元八八五年—八九七年）藤原佐世奉敕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仍有基本的反應，其中內容分為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異說、小學、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罰、雜傳、土地、譜系、簿錄、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五行、醫方、楚辭、別集、總集等四十大類，共計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卷，偶或穿插少數日本自作的典籍，但是不影響整體大觀，何況這還不包括自中國輸入之佛教經典。再者，如果把各寺院及民間收藏的東西也算在內，恐怕不只以倍數計，只是無從統計而已。②這些隋唐時代引進的文物對於日本奈良、平安時代，上至於國家的典章制度，下至於社會風俗和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の研究》③、木宮泰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④以及專家學者的研究篇章都有詳細的論述，我們不再贅言。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國文物中就有部份是這一時期傳入的東西，已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並珍藏在公私立博物館或圖書館中，或成為各寺廟的鎮山寶物。

到了宋代，日本的遣唐使雖告終止，但是隋唐以來開通的海運及設立の幾處市舶司，斷絕不了民間貿易的往來。尤其雕版技術的進步，使文物的傳播不再受到手工抄錄時，一筆一劃、一紙一書這種少量生產的限制，而是大批的生產與販售。在此情況下，文物生產自然降低了成本，達到了市場經濟的規模。所以在一些文人及法師的日記中，常常可以看到宋版書籍的傳入，甚至進入了宮中。如宋太宗雍熙元年（西元九八四年），東大寺的法濟大師周然等飄洋渡海，除了回饋中

國早已失傳的鄭玄注本和任希古撰的《孝經新義第十五》各一卷外，同時也帶回一部開封太平興國寺雕印的開寶《大藏經》，這是我們今天所見最早傳入宋版書的記錄。此後不久的長元二年（西元一〇二九年）四月，藤原賴通在大中臣輔親官邸也見到了獻給日本天皇的《玉篇》和《白氏文集》。再者，當時的中國商人往往也以新雕宋版書籍作禮品，贈送給日本有關人士，時人並以摺本為貴。這段期間輸入與輸出的結果，在平安時代末期成書的《通獻入道書目》與正平年間（西元一三五三年）大道一從編纂的《普門院經論章疏語儒書目錄》二書，都有十足的反映和著錄，可說是研究宋元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重要目錄文獻。這些傳入的典籍有的至今猶完好的保存在圖書館中，而商務印書館編印《四部叢刊》，蒐集海內外善本時，有些還是遠從日本各地藏書拍攝回補。甚至鎌倉時期（西元一一九二年—一三三六年）傳入的慶元版《太平御覽》、《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古籍，早在中國已是佚失的珍貴版本，而在日本都還保存得十分完好，其珍貴自不待言。

南北朝與戰國時代的室町階段，日本著名的五山版雕刻技術已然純熟，開始翻刻中國的古書，但是仍有不少的日本使者來到中國覓求新書，尤其新發展的「宋學」，對於維持皇室帝位有其迫切的需要，才使日本朱子學迅速的發展。另外有規律令與醫書也有其實際的需求，於是不斷的輸入日本。

明朝萬曆中期以後，日本脫離鎖國時代，政經文化交流又有重大的突破與發展，而古籍的傳入除了透過雙方往來的使節團外，民間人士的交流極為頻繁，更有商人大量的販運貿易。當時中國船舶停靠在日本的貿易港，每年多者高達兩百多艘，少則幾十艘。這些番號船除了運來民生貨物外，也攜帶了不少的中國古籍和文物，裝束成箱，每箱套數部種雖有不同，然而以文化十二年

(西元一八一五年)南京船永茂號貨物報單登錄，共載書十五箱、三十二種、二百六十部、六百二十二套，若以此為計，約略可以估算一年之間輸入書籍的數量。當時刻書中心的南京、杭州和福建建陽等地，透過南京、寧波、泉州等優良港灣，每每成為文化輸出日本長崎的對話窗口。這些記錄的第一手資料都一一見載於《寶來書目》、《大意書》、《書籍之帳》、《落札帳》等資料中，經過關西大學大庭脩教授的整理研究後，已經刊行了《舶載書目》。統計江戶時期長崎港輸入的文化商品少說也有七千八百九十三種，而非以商品名義輸入的載籍還不計其數，足見輸入量之大。也因此緣故，元祿元年(西元一六八八年)，田中清兵衛特地開設了一家專門販售中國書籍的「唐本屋」，並把店中的商品編成《唐本目錄》，共收錄了中國古籍一千零九十九種，證明這家販售唐本書店已達一定的規模。至於這個時期輸入的商品書籍，其中大半都已經成為日本各圖書館珍藏的海內外孤本，而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本小說叢刊》⑤、臺北學生書局編輯的《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⑥以及《思無邪匯寶》⑦等刊印時，當中就存有不少這階段傳入的載籍。

今天我們只要走訪日本的正倉院、石山寺、真福寺、東福寺等地以及各圖書館，其所保存的中國古抄本都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唐宋舊抄本，而足利官學與金澤文庫更收藏了不少的宋板雕本，內閣文庫與宮內廳書陵部收藏的大量漢籍來源更是德川氏建置的紅葉山文庫的舊藏品，恰好呈現日本有意輸入中國文物的幾個階段和所呈現的特色。

然而歷經以上幾個階段的文物交流，到底對日本文化有何影響？誠非簡單的篇章可以道盡，而多少日本學者早已關心到這些問題，紛紛從各個角度或學科切入，並且寫作了極為出色的研究成果。如果還有可議的部分，那是非屬輸入的本土性的文化載籍，往往被認為既非屬於中國學，也非日本國學領域，恰好處在三不管地帶，身分備極尷尬的日本漢文作品，卻遭到忽略而成沙漠

荒原。因為這些漢文作品在中國文學領域中非屬中國疆域內居民書寫的東西，所以被國籍主流的意識觀所排除，不去提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然而這批日本文人立足在自己的本土上書寫的作品，在日本國文學領域中卻認為它非日本國字的寫作，所以也沒有太多介紹的篇幅，頂多不過是蜻蜓點水般的描述一下而已。其原因何在？誠然耐人尋味。倒是不可否認的一點，他們不是植基生長於自己本土上的花朵，讀者群太少，養分不足，其凋萎也是早晚之事，站在文化傳承的洪流中，他們不敵主流的文學作品。然而如果追根究底，這些漢文作品縱使以中國文字為肌膚，脈絡中流動的卻是日本人的意識型態和血液，在文化和文學的傳承轉化當中，曾經以思想前衛，引領一代風騷的姿態，走向未來，沒想到遭到雙方如此的排斥，弄得兩面不是人，也真無可奈何。在中國周邊的域外漢文學中，這種情況也非獨薄於日本，而是中國與周邊民族以及各鄰國間所共同遭遇的常態問題。

也因如此，要整理這批文物和研討這道課題既迫切，也不是一人一力或少數幾位學者的責任，必須由學界群策群力共同完成，而我們對日本漢文小說的整理完全基於陳慶浩博士唱議的「域外漢文學」這一理念下，先從事「域外漢文小說」的整理，並以能力所及的條件下，進行第三步子課題的出版計劃。至於非漢文小說的詩、文、詞曲等文學作品，以及經、史、子部，佛學及朱子學、陽明學範疇的研究整理，都需要有志者來合力完成，用以補足文化交流中一些大家所忽略的盲點。我們不想追究大多數的日本學者何以視若無睹或輕蔑這批日本文人曾經創作的漢文小說，只要正視本輯收錄整理的結果，證明它的確是存在的話，則其對於日本文學界的些微影響，也應該給予確認。如今我們將收集的這批作品，以傳統中國小說的觀念和現代的要求加以省視，約可分成下述六類：

一、章回體小說

(一) 講史

1. 《太平記演義》：岡嶋冠山作，享保己亥（西元一七一九年）秋新編。
2. 《忠臣庫》（《海外奇談》）：乾隆五十九年鴻濠陳人重譯及序文，文化十二年乙亥（西元一八一五年）五月吉日，兩國吉川町／東都書林山田佐助／湖東與兵衛出版。
3. 《海外異傳》：共七回，津藩齋藤正謙著。嘉永庚戌（西元一八五〇年）新鐫，惜陰書屋藏梓。
4. 《西征快心編》：巖垣月洲著，安政四年（西元一八五七年）左右執筆。

(二) 世情

5. 《東都仙洞餘譚》附錄《新橋八景佳話》：愛花情仙著／此中生評，明治十六年（西元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成書，八月出版。
6. 《警醒鐵鞭》：五回一冊，田中從吾軒先生著／弟小永井小舟先生評，明治十九年（西元一八八六年）九月「警醒一鞭」序。
7. 《譯準綺語》：一冊，菊池純譯述，明治十八年（西元一八八五年）〈自序〉，足立菰川訓點。
8. 《三山祕記》：金子強著。抄本一冊
9. 《枕藏史》：抄本一冊，枕史氏戲譯。

二、傳奇

三、筆記談叢

1. 《日本七福神傳》：一冊，寓關東摩訶阿賴耶撰，元祿龍集戊寅十一年（西元一六九八年）菊月穀旦銅駄坊書肆村上平樂寺壽梓。
2. 《含錫紀事》：刻本一冊，熊阪台州著，寬政壬子（西元一七九三年）五月東都書肆青藜閣刊。
3. 《本朝小說》：刻本一冊，川合仲象作。寬政九年（西元一七九九年）序。
4. 《賢乎己》：刻本一冊，淀橋山井元行二無為著。安政己未（西元一八五九年）自序。
5. 《日本虞初新志》：（缺卷三一七）刻本，近藤元弘編輯，明治辛巳夏高松片山達序。
6. 《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誌》：三卷三冊，菊池純著，明治十五年壬午（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田百川學海序，東京書估／文玉圃梓。
7. 《譚海》：刻本四卷，分裝四冊，依田學海著，明治甲申（西元一八八四年）七月上梓，明治壬午桂月兩香岡守節代書之三溪《談海》〈序〉。
8. 《夜窗鬼談》：鉛印本，上下二冊，石川鴻齋編。上冊卷首明治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九年）鴻齋石英居士自序印刷所東陽堂「明治二十七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七月廿一日印刷／同年七月廿四日出版／同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二版發行」。篇末每有石子、寵仙子及案語等評。
9. 附錄：(1) 〈浦島子傳〉，(2) 〈續浦島子傳記〉。

1. 《大東世語》：五卷二冊，服部元喬撰，鶴孟一寬延改元（西元一七四八年）十月孟冬《大

東世語》〈序〉，靜齋藏刊／寬延三年（西元一七五〇年）庚午春三月日，江都書肆高山房梓。

2. 《譯準開口新語》：岡白駒撰，刻本，一冊，播磨清絢寬延辛未（西元一七五一年）之春三月序。「寬延四年辛未之春，馬月堂莊左街門梓」之牌記。

3. 《奇談一笑》：刻本一冊，西田維則遺著、岡白駒緝，明和五年（西元一七六八年）奚疑翁主人跋識。

4. 《困譚》：刻本，一冊，高岡木一貫孟恕著。文政甲申（西元一八二四年）秋上梓，橘洲陳人題困談序。

5. 《啜茗談柄》：二卷一冊，鈔本。南成山人藍澤祇著及文政十年（西元一八二七年）秋七月自序。

6. 《如是我聞》：觀益道人著。生平年里不詳。本書當是西元一八三二年後，天保年間撰述。

7. 《奇談新編》：刻本、一冊，有天保壬寅（西元一八四二年）三橋子書於浪華寓居序文。

8. 《當世新話》：刻本，一冊，藤井淑編，依田百川評。明治八年（西元一八七五年）／五月刊行 奎章閣發兌。

9. 《昔昔春秋》刻本、一冊，中井履軒著。青藜閣／名山閣梓。明治十三年庚辰（西元一八七六年）出版，為一小冊子。

10. 《談叢》：共二卷二冊，依田百川學海著，有明治三十二年己亥（西元一八九九年）十月門人岡崎壯識之〈凡例〉五則。

11. 《寒燈夜話》：排印本，一冊，廣田直三郎著。有大正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負山堂主人自序。

12. 《淞北夜譚》：排印本，一冊，信太英著。昭和二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八月印刷。

13. 《大東閩語》活字本，一冊，平安金羅麻著。封面脫，無序。

以上這些作品，如果承認它是合於標準的日本漢文小說，則再檢視一下寫作與刊刻時間，除了兩部隸屬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作品外，恰居於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期近兩百年間，其中所反映的現象可以說明者有二：

一、日本漢文學的發展恰與中國漢文學的生命週期息息相關。若以乾嘉為界，傳統漢學或漢文學的發展正由曲線的高峰開始反轉，走向下坡，於是詩、文、詞、曲、小說等各種文類，有如刺鳥般發出了淒艷哀鳴後，隨即日下江河，縱有不世出之人才，再也無法力挽狂瀾。晚清之際，國力日漸式微，加上西學的衝擊，縱使勉強裝腔作勢，不過是跌深反彈之後的一股屍積餘氣。從此，漢學或漢文學的發展已經不能鎖國閉關，必須逐漸融入國際學術的範疇中，成為國際文化或世界文學潮流系統中的一股支流。日本漢文學的發展，歷經奈良、平安時代，到江戶階段，前後引進中國文化的結果，到了江戶末葉及明治初年期間，恰是已然成熟，並且開出了燦爛的花朵。甲午戰後，日本的漢文學不過是晚清時期的翻版而已。

二、在十八世紀內近百年間，漢文小說首先發軔於元祿龍集戊寅十一年（西元一六九八年）《萬關東摩訶阿賴耶撰的《日本七福神傳》》，然後是享保己亥（西元一七一九年）秋岡嶋

冠山新編的《太平記演義》，（西元一七四八年）服部元喬撰述的《大東世語》，寬延辛未（西元一七五一年）岡白駒的《譯準開口新語》，明和五年（西元一七六八年）西田維則遺著、岡白駒所輯的《奇談一笑》，最後是寬政壬子（西元一七九三年）五月熊阪台州的《含錫紀事》及寬政九年（西元一七九九年）川合仲象作的《本朝小說》。這些作品中，恰以十八世紀中葉的岡白駒千里作中介，讓我們了解天明四年甲辰（西元一七八四年）年間曾有《畫引小說字彙》一書的刊刻，正好反映當日研讀中國小說的盛況和需要，而其所援引的中國小說書目，如果一一的追索，幾乎都可在大庭脩教授所整理的《舶載書目》內找到紀錄番船號載運的部數和時間，如今這批書也還都典藏在日本的公私立圖書館中，並且從日本近世作家的作品及長短篇讀本小說中找到面貌上的移形變位。⑧

尤其根據麻生磯次，《江戶文學與支那文學》以及德田武《日本近世小說與中國小說》的研究成果，中國小說對江戶時期的日本近世小說影響最明顯凡有兩大方面：

(一) 中國講史小說對日本軍談小說的影響：軍談小說之譯作原典，以已經學者考訂，凡有：

1. 《通俗三國志》：文山譯，元祿二年（西元一六八九年）至五年刊，小川環樹以為乃名古屋蓬左文庫藏明建陽吳觀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之《三國志》。
2. 《通俗楚漢軍談》：夢梅軒章峰、稱好軒微庵譯，元祿八年（西元一六九五年）刊，據《二十一史例言》，原書應為宮內廳書陵部藏之明萬曆壬子金陵周氏大業堂刊重刻甄偉編

《西漢通俗演義》。

3. 《通俗唐太宗軍鑑》：夢梅軒章峰譯，元祿九年（西元一六九六年）刊，德田武考定原書應為宮內廳書陵部藏之熊鍾谷編潭陽書林三台館刊本之《新刻按鑑演義全傳唐國志傳》。
4. 《通俗列國志前編、後編》：清地以立譯，寶永二年（西元一七〇五年）、元祿十六年（西元一七〇三年）刊，據〈二十一史例言〉，原書應為內閣文庫藏之明萬曆乙卯序姑蘇龔紹山刊《新鐫陳眉公先生評點春秋列國志傳》。
5. 《通俗南北軍談》：一鷄譯，寶永二年（西元一七〇五年）刊，據〈二十一史例言〉，原書應為國會圖書館或宮內廳書陵部藏之天花藏主人康熙癸丑花朝序、永慶堂余郁生刊《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
6. 《通俗北魏南梁軍談》：一鷄譯，寶永二年（西元一七〇五年）刊，據〈二十一史例言〉，原書應為國會圖書館或宮內廳書陵部藏之天花藏主人康熙癸丑花朝序、永慶堂余郁生刊《精繡通俗全像梁武帝西來演義》。
7. 《通俗列國志十二朝軍談》：李下散人譯，正德二年（西元一七二二年）刊，據尾武氏以為原書應屬神宮文庫藏余象斗明雙峰堂三台館刊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
8. 《通俗宋史軍談》：松下氏譯，享保四年（西元一七一九年）刊，據德田武考定，原書應為內閣文庫藏之熊鍾谷編潭陽書林三台館刊本之《全像按鑑演義兩宋志傳》。
9. 《通俗兩國志》：入江若水譯，享保六年（西元一七二二年）刊，長澤規矩也認為即熊大木（鍾谷）書林雙峰堂刊《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10. 《通俗隋煬帝外史》：西田維則譯，寶曆十年（西元一七五七年）刊，德田武以為其原書

應為《新鵠通俗全像演義隋煬帝艷史》。

11. 《通俗元明軍談》（內題《通俗皇明英烈傳》）：岡嶋冠山譯，寶永二年（西元一七〇五年）刊，德田武考定其原書應為《通俗皇明英烈傳》的忠實翻譯。

此外，如《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與《通俗續三國志》，以及《通俗台灣軍談》與《靖台實錄》之間的關係，德田武也都一一詳加比較，可以想見，講史小說對於日本軍談小說影響之一斑。

（二）讀本小說及長篇讀本的開展

《英草紙》之與三言，庭鐘之與《西湖佳話》、《聊齋誌異》、《四聲猿》、秋成之與《水滸傳》，曲亭、馬琴等諸人的作品中，或與《石點頭》、《杜騙新書》、《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通俗金翅傳》、《金瓶梅》等小說，甚至《玉搔頭傳奇》、《琵琶記》、《桃花扇》等戲劇作品，多少都有一些牽扯，麻生磯次或德田武教授等的作品中也都一一舉證，詳細比對。

這樣繁多而明顯的鐵證，應該足以說明日本江戶期間近世小說受到中國小說輸入的影響一般。不僅此也，日本江戶期間的近世小說從初期翻案的生吞活剝，到逐漸的圓熟，終於融化於自身的國文學中，成就一己獨特的風格面貌後，又成為後來作家創作時汲取的養分，影響了日本近代作家如幸田伴露、芥川龍芝介等的作品。今天我們在馬琴的日記中，讀到文政十一年（西元一八二八

年)五月二十一日附殿村篠齋宛書簡、十月六日示篠齋書簡、文政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三月二十六日、天寶六年(西元一八三五年)正月十一日附的篠齋宛書簡等，對於《水滸傳》、《檣机間評》、《綠牡丹》、《兩交婚傳》、《平山冷燕》、《隔簾花影》、《金瓶梅》、《西廂記》、《石點頭》等書的批評意見，可以想見當日作家旁邊擺置的一面鏡子是什麼，以自身創作時的反省和觀照。事實上，馬琴《八犬傳》正文外的餘筆中即說：「《俠客傳》是吾得意戲墨。」^⑨其中可以找到《女仙外史》、《平妖傳》、《好逑傳》、《快心編傳》、《拍案驚奇》、《今古奇觀》、《醒世恆言》、《水滸傳》、《封神傳》、劍俠小說類等的部分影子。若肇風氣之先者，首推岡島冠山，他既博通俚言俗語，而經其譯解後的小說也就不同於往昔，是以海內為之風靡。這些譯解之作，先有貞享三年(西元一六八六年)的《百物語評判》及正德三年(西元一七一三年)的《漢乘合船》，尤其寶曆七年(西元一七五七年)冠山譯刊《通俗忠義水滸傳》之後，出刊的作品更如雨後春筍，如寶曆九年(西元一七五九年)天花藏主人《通俗醉菩提》、寶曆十年(西元一七六〇年)煙水散人《通俗隋煬帝外史》、天明五年(西元一七八五年)文山《通俗三國志》、寬政二年(西元一七九〇年)宿屋主人《醒世恆言》、寬政三年(西元一七九一年)紅葉園《通俗白狐通》、享和二年(西元一八〇二年)本維舟《通俗平妖傳》等，一一譯解問世。至於伊丹椿園天明元年(西元一七八一年)刊行的《怪異叢談》五卷也是模仿林羅山元祿十一年(西元一六九八年)的《怪談全書》體例，然後自《太平廣記》、《獨異記》、《王氏見聞》、《續怪錄史》、《瀟湘錄》等十五部中國志怪小說裡選出二十篇故事加以譯述。最受學界矚目的是《剪燈新話》與《伽婢子》、及續篇《狗張子》^⑩之間的關係，已有不少的探討文章，不再贅言。而初期的讀本作家如都賀庭鐘、上田秋成、伊丹椿園等不受中國小說影響的可說很少。就以一部《水滸傳》的